



文化中国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编

文化强国
理念与实践

惠鸣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文化强国
理念与实践

惠
鸣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强国：理念与实践 / 惠鸣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文化中国书系)

ISBN 978 - 7 - 5097 - 4802 - 2

I. ①文… II. ①惠… III. ①文化事业 - 方针政策 - 研究 - 中国 IV. ①G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7172 号

· 文化中国书系 ·

文化强国：理念与实践

著 者 / 惠 鸣

出 版 人 / 谢 寿 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桂 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陈 帅 桂 芳

责任校对 / 孙光迹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4802 - 2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18.5

字 数 / 236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 要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在新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先进的价值观来引领，需要强大的文化产业和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支撑，需要系统的国家战略来保障，更需要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和理念创新来驱动。新文化发展观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面向市场化、全球化的文化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自觉、思想解放和文化发展理念创新的核心成果。本书共五章，探讨了新文化发展观的历史形成、内涵及其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宏观实践与微观案例。

第一章探讨新文化发展观的历史形成及其基本内涵。新文化发展观滥觞于全球媒介汇流和数字化时代到来的背景，形成于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并在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校验。新文化发展观的产生是我国文化建设领域的重大突破，它的形成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新文化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构全面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的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它们以落实公民文化权利为理论基础，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实现路径，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驱动引擎，并最终指向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

第二章探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仍需遵循若干规律：正确对待文化的多种属性，避免将文艺的功能简单地政治化；尊重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保证文化表达自由和文艺创作的繁荣；正确认识国家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坚持把法制精神作为管理文化的第一原则，为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构合理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消费需求增长强劲，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文化投资快速增长，文化发展的理念和认识不断更新，这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重大机遇。但文化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若干重大挑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更大的创新空间；必须突破优秀文化内容产品相对短缺的困境；必须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还必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当前改革重心应当围绕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二是加强文化立法；三是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环境；四是加强公民文化权利保障；五是加强社会配套改革。

第三章以昆明市盘龙区和北京市为个案，探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战略及文化产业政策环境的优化问题。昆明市盘龙区的案例表明，有效利用丰富多样的民族和地域文化资源，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发挥创意产业集聚优势，建设宜居城市，是西部民族地区打破经济弱势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战略崛起的重要选择。北京市的案例揭示了我国大都市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全球创意都市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后奥运时期，北京市必须通过推动文化产业跨业整合、加快提升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水平、以数字内容产业等高端业态带动京津冀区域内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整合和升级等战略对策，来应对文化

创意产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文化创意产业高度依赖于文化创意活动，“十二五”期间，我国要继续优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体制、法律、金融、税收和产业政策等“硬环境”，更要高度重视并优化由社会文化创意活动与创意氛围组成的“软环境”。

第四章结合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长武县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嘉兴市，探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挑战与实践经验。长武地区的案例分析揭示了近百年来文化发展与我国农村地区现代化进程的逻辑关系。在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文化发展始终是社会现代化的引导力量和重要标志。对我国农村社会而言，由于与前现代生活传统渊源深厚、文化发展长期落后，且长期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约，人的精神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任务要远比物质现代化的任务艰巨。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必须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将其作为推动农村文化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总抓手。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包括市场目标、制度目标两个建构目标，以及娱乐目标、教育目标和保护目标三个价值目标。

嘉兴案例总结了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领域取得的重要突破和经验。“嘉兴模式”创造了全国领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互动化、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网络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集成化、公共文化服务内涵深耕化、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多样化等6个方面。文化自觉是“嘉兴模式”的生成之道。面向未来，嘉兴市需要通过打造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发展的新格局、开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提供主体多元化新局面、建构公共文化服务决策新机制、拓展公共文化服务新边界等多种方式，努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迈上更高的阶梯。

第五章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并通过新疆双语教

育和边境民族地区国有文艺院团改革问题探讨我国民族地区文化政策调整与创新的问题。

在文化强国的战略宏图中，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战略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来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主要应包括：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战略、民族地区现代传媒体系建设战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战略、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陆地边境“文化纽带”建设战略、少数民族人口教育水平提升战略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承发展战略。

新疆双语教育问题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边境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性。新疆双语教育推进对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提高新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个人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双语教育的深入推进必将改变新疆语言生态和文化发展格局，是利国利民的重大文化事项。近年来，新疆地区在新一轮双语教育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本质是能否遵循双语教育的规律问题。要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完善新疆双语教育的目标和相关政策，使之回归双语教育的本质；要充分准备双语教育的相关条件，有序推进双语教育普及的进程；要全面强化双语教育的配套措施，为双语教育成功推进提供强力支撑。

边境民族地区国有文艺院团改革问题集中反映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特点及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特殊性。根据边境民族地区国有文艺院团在当地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难以通过市场化方式生存的现状，这些地区的文艺院团改革不宜采取内地“一刀切”的方式，而应采取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因团制宜、强化功能、优化机制的改革方针，以灵活多样的模式进行改革，确保其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在改革中得到巩固和加强。

前 言

一 中国发展模式中的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经济实际上采取了以 GDP 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著名的“蛋糕理论”，即只有先把蛋糕做大了，所有人才可能分到更多。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都将促进 GDP 的增长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来抓。由于经济基础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中国经济在追求 GDP 增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资源投入和吸收外资共同拉动的输入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在近 30 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进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存量国。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膨胀，这种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也日益凸显。首先，不断加深的环境危机使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发展的代际公平被破坏。其次，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日本 1960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395 美元，1961 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17142 美元，工资水平超过美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30 年，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 4%。在这 30 年中，作为吸引外资最成功的珠三角地区，每年经济以远高于 10% 的速度增长，但在 20 世



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的 10 多年间，农民工工资原地踏步，几乎没有增长！与低工资、低水平的劳动保护、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相伴生的是“血汗工厂”和“带血的 GDP”，这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最后，宏观经济对外资、外贸依存度过高，国民收入与 GDP 之间存在巨大缺口。2007 年，中国外贸额占 GDP 的 66%，而外资企业对外贸总额的贡献度在 60% 以上。在这种结构中，GDP 的相当一部分是外资收益，作为利润转出国外，与中国国民福利无关。如果从中国的 GDP 中减去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黑色 GDP”，然后再从其中减去实际由外资抽走的“外资 GDP”，余下的 GDP 就会大打折扣。这种发展模式自身也面临重重危机。一是全球资源供给的承受能力面临中国式需求的严峻考验。这在全球海运价格、铁矿石价格因为“中国需求”而大幅上涨的危机中不难窥出端倪。二是高度依赖外贸为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受 2007 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中国 30 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巨额外汇面临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以 GDP 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政府将大部分精力投到经济领域的管理和发展，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间的大大部分时间里，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协调发展被忽视，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发展改革进程缓慢，严重制约着社会整体发展。

在政治领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的第一个认识就是“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进而又发展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论断。为维护改革发展的社会环境，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发展和实现极为谨慎，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缓慢。由此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如执政党党内民主不健全、党外监督力度不足；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力集中、公共权力部门化、官僚主义、机构臃肿、家长制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主

义新型政治文明的建设。

在社会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平。在“蛋糕理论”的支配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指标中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方式，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3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高出0.4这一安全警戒线，社会风险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经济领域的不公平还延伸到社会领域，不少地方为了吸引投资者，不惜以社会公正为代价，赋予资本家以种种“法外特权”，严重腐蚀着社会的民主肌体和公平正义。与此同时，一些市场化导向的民生改革，在方案设计时一味追求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结果导致市场机制对公民利益的剥夺，民生领域的不公平程度加剧。20世纪末期开始的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改革所积累的教训足以引起反思。

在文化领域，忽视均衡发展的第一个影响是对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重视不足。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文化服务投入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严重短缺，效率低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人均拥有的图书馆图书、博物馆藏品长期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大批基层文化机构名存实亡。二是公民的文化权利实现程度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公民的表达权、知情权、批评权、监督权等距充分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第二个影响是国民在文化资本领域的不公平程度加剧。相关研究揭示，中国大陆地区国民受教育的公平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结束前，总体趋于公平；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总体走向是公平程度下降，这在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收入阶层之间体现得尤为突出。文化资本是个人就业和获得发展机遇的最重要私人资源，其公平程度的下降必将对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第三个影响是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思想严重侵蚀着教育

的灵魂。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某些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实际上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精神和自主批判精神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对接错位使学生接受不同的价值标准，最终导致国民公、私领域的双重人格，每个人都对公共生活中的剧场效应习以为常。这些因素，对建构以诚信、真诚、民主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公民精神是一个极大的阻力。

国外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由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的时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在较长时期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前期的日本，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新加坡、韩国；另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矛盾凸显时期，处理不好，便会落入“现代化的陷阱”，使国家的发展陷于停滞、倒退状态。

中国人均 GDP 在 2006 年突破 2000 美元，刚刚跨过低收入阶段，开始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但国家的发展方向却处于抉择的关口。继续现有的发展模式，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将无法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必将在某个临界点集中爆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会遭受严重挫折。因此，偏好 GDP 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向“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型，以适应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完成两个重要的转型：一是要从环境污染型向生态友好型转型，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高技术与高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意产业；二是要从外贸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化，切实提高国民收入，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使全体国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更直接的收益和好处。

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这种转型，文化是关键因素，“增长”可以归结为经济问题，而“发展”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命题。发展是促进人类选择自由的过程，也是促进人类幸福增长的过程。从文化价值上对发展的目标、内涵进行彻底的反思，才可能扬弃以单一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建立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和新发展模式。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发展自身担当着先锋的角色。无论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建构公民伦理、实现公民文化权利，还是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对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诸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自然环境，决定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目的与手段的反思，决定了我们面对功利和诱惑时的取舍，也决定了我们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艰巨任务时的魄力和决心。

文化已经居于中国发展问题的中心。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发展的核心命题是经济增长，那么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中，中国发展的核心命题注定是文化发展。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加接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强国这一时代主题的深刻内涵。

二 全球文化竞争与中国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文化发展的地位日益重要的同时，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问题也日益凸显，成为国际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密切融合的重要领域。冷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互联网崛起，信息社会全面到来。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以意识形态斗争为内核的文化斗争谢幕，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贸易全球化浪潮及互联网革命的推动下，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迅速演变为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这场国

际竞争是国家间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创意能力、文化产品生产和输出能力、文化产业综合实力的全面竞争。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市场的发展，都已经深深受制于国家间提升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这一基本逻辑。

在由文化产业竞争引领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竞争中，数字化革命（互联网革命）引导全球文化市场发生深刻变革。首先是网络视频、网络电视、网络广告、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等在线文化市场快速崛起，传统的广播、电视、图书、报刊、出版、文化产品与服务销售业不断萎缩，广播电视、电信、互联网三网融合，移动互联网主导文化产业未来方向。其次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代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主战场是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无论是网络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还是高新技术与装备在传统文化产业领域的应用，都对文化企业竞争力提升和文化产业业态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好莱坞大片的高科技神话到 iPhone 手机的商业奇迹，从腾讯的崛起到百度的成功，无不是以文化与科技融合谱写着商业成功的突出案例。

在全球文化产业发生深刻革命的同时，资本市场对文化产业的介入不断深化，资本并购成为改变文化市场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快速增长的文化产业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各种风险基金进入文化市场。跨国并购、兼并重组成为文化企业迅速发展和走向全球的重要动力。技术、资本和全球市场成为国家文化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面对全球文化竞争中的重大趋势性变革，各国纷纷调整文化政策，进行战略性应对。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本国创意经济发展，鼓励本国文化产品和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创新热潮从澳大利亚



开始，迅速蔓延到英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号称没有文化政策的美国也加入这场国家文化利益的竞争。美国 1996 年《电信法》打开了本国媒介汇流的闸门，为本国互联网和新媒体产业在更长时期内雄霸全球奠定了基础。2003 年，美国又一次修改《版权法》，进一步延长版权保护期限，为本国文化产品和版权产业谋求最大利益。在促进全球贸易的 GATT 和 WTO 谈判中，“文化例外”一度被法国、加拿大等众国家用来对抗美国文化产业，保护本国文化内容在国内文化市场的份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公约》，致力于用文化多样性来促进形成一种更为公平的全球文化发展格局。

面对国际文化竞争领域的巨大变化与机遇，中国已经无法置身局外。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需要有强大的文化支撑。对于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需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树立国际文化身份，团结和凝聚人民。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中国更需要在文化上崛起，形成强大的国家文化综合实力和软实力。但文化上崛起的难度远非经济上崛起的难度可比。正确的发展思路、开放的政策、人口红利，再加上资源的付出和环境的牺牲，可以使中国在短短 30 多年间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在一个话语体系、传媒渠道、文化产业、网络与信息技术领域都由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文化与政治秩序中，中国的文化崛起面临着比经济崛起更为艰巨的挑战。必须承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全球收获的文化利益远远小于所收获的经济利益，30 多年来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成果也远远小于国家硬实力提升的成果。中国在革新文化发展理念，建构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文化发展战略方面所面临的难度远远高于适应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难度。建设在全球具有重要文化影响力和巨大文化利益的文化强国，极有可能

是中国在 21 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的竞争和压力，还来自中国自身。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和新文化发展观的确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向“左”与向“右”、开放与收缩、激进与保守的不断交锋中回旋前进的，这样的交锋时至今日仍未中断。可以预见，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下一个 30 年，这样的交锋仍将长期存在，而这种交锋最有可能决定中国文化崛起的前景。

毋庸置疑，文化强国的最大挑战来自思想解放能否最终完成，以及何时完成。如果说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之后，中国经济依然未能完全排除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下一个 3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文化发展依然面临着在解放思想的峡谷中艰难穿行的窘迫。只有真正完成了思想的解放，中国才能在文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上快速前行。因此，面对全球文化竞争和建设世界文化强国的挑战，中国首先需要解放思想，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建构自己的文化发展理念，并以之为基石去构建本国的全球文化发展战略。

三 文化发展观是文化战略的内核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而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取决于系统、全面的战略部署，也取决于文化政策的不断创新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但是，无论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化战略的确立，还是文化政策的创新与发展，都首先依赖于文化发展观的创新。文化发展观是文化战略与文化政策的灵魂，是文化战略的内核。与文化发展观的决定性力量相比，文化体制只是国家范围内的文化权力与资源的分配机制，而文化政策更大程度上属于技术性设计的问题。文化发展观

的创新与建构才是我们时代文化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政策领域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面向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新文化发展观。这一发展观包括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建设成支柱产业）、构建公平平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一系列具有改革开放时代背景的观念和内涵。

深入研究这一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生成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它引导下的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挖掘它的内涵与创新空间，对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实现文化强国宏伟战略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作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新文化发展观：文化强国的理念自觉	1
第一节 走向新文化发展观：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	2
第二节 文化发展：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	27
第三节 文化生产力：改变中国的“软”力量	31
第四节 文化产业：国家创新的新动力	43
第五节 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公平的制度保障	49
第六节 文化安全：全球视野中的文化竞争	61
第二章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机遇和挑战	78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78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88
第三节 制约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几个因素	97
第四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101
第三章 文化产业的中国实践	109
第一节 昆明市盘龙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定位研究	109
第二节 后奥运时期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132
第三节 文化产业软环境及其优化	144